

中國學術界對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 的研究

A Review of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on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張凱銘 *Chang, Kai-ming*

嘉義大學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生

Master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建構主義這個新興的國際關係理論已在中國被迅速地接受和蓬勃地發展著。本文簡述建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發現當代中國對國際關係之觀點的改變和政府持續的推動改革開放是中國具有良好研究環境的兩個主要原因。此外，還有三個有利的重要因素：(1)中國文化已是中國傳統不可分割的一部份；(2)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建構主義肥沃的土壤；(3)現實主義之外，建構主義打開了觀察真實世界的另一扇窗戶。目前，我們期望中國學者可以藉著理論的本土化，更多的個案研究和更廣泛及更平衡的人力配置來深化他們的研究。

Constructivism, a newly emerged international theory, has been quickly accepted and prosperously developed in China. This article has brief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vism in China and found that a change of current Chinese per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tinuity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ness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a favorable research environment in China. Besides, three factors are also important: (1) Chinese culture is already existed as an inalienable part in its tradition; (2) Marxism has become a basic philosophy for social study in current China, and therefore, provided a well-cultured land for the study of constructivism; (3) constructivism has opened another window for observing this real world. At present time, we hope that Chinese scholars can further their study by the indigenization of theory, by doing more case studies, and by a widespread and balanced laboring.

關鍵詞：建構主義、中國、中國學者、國際關係理論

Keywords: constructivism, China, Chinese schol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壹、前言

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是近年來在歐美學界中興起的國際關係理論。透過吸收社會學(sociology)、語言學(linguistics)等學科的資源，並對其他國際關係學派如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等加以借鑒，該理論從觀念、建構與文化等概念出發，提供了人們觀察國際政治的一個嶄新視角。建構主義在 90 年代末期逐漸發展成熟，並走出歐美地區，進入了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發展至今，根據部分資料顯示，在前後約十年的時間中，中國在建構主義研究呈現了不俗的成果。就此，本文希望透過對以下三個面向的簡要討論，對當代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中的建構主義研究進行探討：

1. 建構主義研究在中國的發展與相關學術研究成果。
2. 建構主義在中國順利發展的原因。
3. 相關研究的特色與發展空間。

貳、中國的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發展

回顧中國學界對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歷程，有兩個比較重要的指標：第一個指標是 1998 年學者劉永濤在《世界經濟與政治》期刊中發表的〈西方新現實主義理論與建構主義批評〉一文，該文可能是中國學界中最早以建構主義理論為主題進行研究並公開發表的文獻，¹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第二個指標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的引入。溫特(Alexander Wendt)所著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是建構主義學派的重要著作，將過去長期處於理論圈邊緣的建構主義一舉推入主流圈中。該書於 1999 年出版後，隔年即由

¹ 薛立、肖歡容，〈中國的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研究：成就與不足（1998~2004）〉，《世界經濟與政治》（中國），第 8 期(2006)，頁 40-48。

秦亞青進行翻譯，透過上海人民出版社引入中國，²該書並迅速成為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中被徵引率最高的著作之一。³

上述二個指標標誌著建構主義理論在中國學界中的興起。但要確切地說中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出現了建構主義研究熱潮，仍須提出具體研究成果方足採信。對此，有幾位學者進行了簡要的調查與評估，統計了近年來中國學界對於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成果。

楊廣對於中國的建構主義理論研究進行了概要的統計，發現至 2003 年 2 月為止，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與建構主義有關的著作至少包括「學術著作 7 部，其中譯著 3 部，專著 2 部，包含建構主義內容的西方理論概論性著作 2 部；在主要刊物上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共 42 篇，其中譯文 4 篇，理論研究文章 28 篇，案例研究文章 10 篇。」⁴

薛力與肖歡容整理了在 1998 至 2004 的七年間發表於核心期刊中以建構主義理論為研究主題的相關著作約莫 72 篇。透過對這些文獻的歸納，他們指出在七年之間，僅以發表研究成果計，在中國就至少出現了 50 人以上的研究團隊，且大部分研究者都屬於四十歲以下的青壯派。⁵

郭樹勇就文獻來源作了概要的探討，據其估算，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相關文獻來源「涉及社科院、外交部、國防部以及高教學府等幾乎所有研究機構與大學，發表陣地遍及各主要國際關係理論雜誌。」這說明建構主義研究的範圍已經相當普及，並不限於一般高校系統的學者之間。對於建構主義理論研究在中國的成果，郭樹勇的評斷是：「單就論文發表一項，可能是美國近十年同項數量的總和。」⁶

² 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0 年)。

³ 楊廣，〈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在中國〉，《歐洲研究》，第 4 期(2003)，頁 140-150。

⁴ 同上註。

⁵ 薛立、肖歡容，前引文，頁 40-48。

⁶ 郭樹勇，〈試論建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前途〉，《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7 期(2004)，頁 21-28。

透過上述估計，應可確信建構主義理論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勢道頗為強勁。且筆者認為上述估計可能仍偏於保守：以薛力與肖歡容的估算結果為例，其選文來源限於經其篩選的 13 本核心期刊，選文標準限於以建構主義為研究專題者。因此該文所得到的統計結果可以說是中國學界對建構主義理論研究的部分重要成果統計，而不是對研究成果整體的全面性呈現。如將其他國際政治期刊一併納入統計範圍，並同時將研究中涉及建構主義理論面向的著作一併計入，相信實際上的研究著作應當不止於上述的數量。

雖然根據上述的數量層面觀察，會發現中國學界中對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似乎成果豐碩，但在數量以外，為了更進一步瞭解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或許可加以進一步探討。

本文以下將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論述。首先，本文將對中國學界的建構主義研究進行類別區分，對各類別研究特色加以評述並揀選部分文獻加以探討，以求側窺中國研究著作的內涵與取向。其次，本文將對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進展進行原因探討，釐清其於中國成功發展的原因。最後，則就相關研究的特色與發展空間進行檢討。

參、中國學者研究類型與案例

一、相關研究類別概述

關於中國學者對於建構主義研究的類別應如何區分，學者各有不同觀點，例如楊廣的「理論研究、譯文譯著、個案研究」三分法、薛力與肖歡容的「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二分法等。

本文在分類模式的選擇上，在參考相關學者觀點後，首先排除了對譯文譯著部分著作的探討，主要的考量是該類著作嚴格來說並非屬於「中國學者研究」。對於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兩類別則予以保留，但將後者進一步區分為「理論本體研究」與「理論連結研究」二類。因此，本文以下將就相關中國文獻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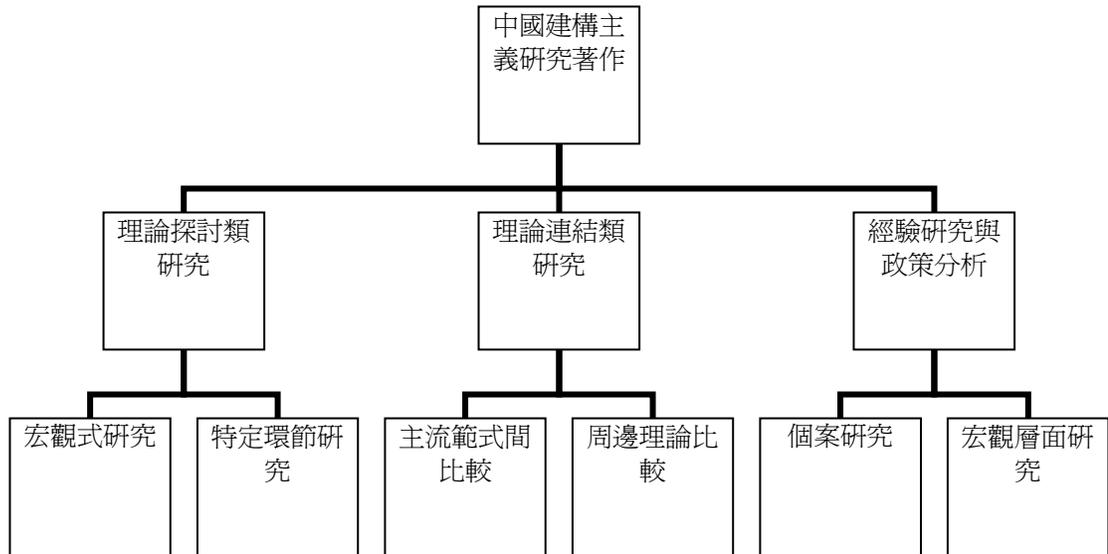
理論探討、理論連結和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等三類別加以區分探討。

所謂理論探討類研究，該類著作主要以建構主義的理論本體為探討標的，或是對其思想淵源、理論價值的議題加以探求。這類研究可以進一步分為兩類：一類研究的視角較為宏觀，以建構主義的發展歷程或理論全貌為探討對象；另一類的研究則較為細緻，就建構主義理論中的特定環節如無政府狀態、結構—施動者關係等進行分析。

理論連結類研究的著作多將建構主義理論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進行對比分析。相關著作內容包括二類：一類是主流範式間的比較，將建構主義與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等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主流學派進行比較研究；另一類著作則是周邊理論比較，將建構主義與主流理論圈以外的理論學派如英國學派(English school)、女性主義理論(feminist theory)等進行對比分析。

在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的部份，這類作品主要是以建構主義理論作為分析國際政治或評價中國外交政策的途徑。相關作品亦有二類之分，一類是個案式研究，以特定個案或議題作為分析探討的對象；另一類則是宏觀式研究，以國際政治的宏觀結構變遷為研究標的。

綜上所述，本文所採取的分類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一 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著作類型區分

二、案例分析

為求更明確的呈現各類別研究的性質，以下將自各類別中揀選部分文獻進行簡要探討與評述。

(一)理論探討類研究

1. 宏觀式研究--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

秦亞青的〈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一文，並未對特定建構主義理論進行細部的具體探討，而是試圖對建構主義學派的淵源與發展進行宏觀的回顧。該篇文獻主要探討了建構主義的理論淵源、基本理念與其近年來在中國的發展等三個部分。⁷在理論淵源部分，秦亞青指出建構主義至少在社會學、語言哲學與國際關係等三門學科處汲取了大量的學術資源。其中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推動了建構主義的理論基礎建設；而語言哲學與相關國際關係理論如英國學派、溝通交往論等，則協助建構主義設定更為細膩具體的理論架構。

⁷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國際政治研究》，第3期(2006)，頁1-23。

在基本理念部分，該文歸納了建構主義內部各學派間的三大基本認知：以觀念為主並兼顧弱勢物質主義(rump materialism)的世界觀、強調施動者與結構的互構性，以及觀念對行為體身份、利益與行動的巨大影響力。最後，秦亞青引用了部分文獻說明了建構主義研究近年來在中國的成功發展，並提出三點可能的原因：第一，建構主義的部分特色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近；第二，建構主義對應中國轉型中的需求，提供外交實踐的參考。第三，近年來中國學者在國外著作的引進與本土研究著述的積極性。

2. 特定環節研究--宋秀琚：〈淺析建構主義的國際合作論〉

宋秀琚的〈淺析建構主義的國際合作論〉一文屬於本類研究中的特定環節研究。這類研究偏重對建構主義理論中的特定部分進行較深入的探討，與宏觀式研究對廣度的重視形成對比。

該篇文獻試圖透過建構主義的無政府文化論述對國際合作的產生加以說明。該文指出，關於國際合作的議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分別提出了霸權合作論與制度合作論，而透過對建構主義中無政府文化論述的推導，尚可進一步提出第三種關於國際合作的論點：合作文化論。⁸

對建構主義而言，行為體的互動形成身份，身份界定利益，而利益決定行動並構成特定的無政府文化。宋秀琚認為關鍵在於集體身份，當行為體間形成了集體身份後，就會發現彼此間存在程度不一的集體利益，對集體利益的認知將會推動國家進行合作。她並進一步引用了溫特的等級內化概念，強調在第一與第二等級的內化層次(被迫與利益考量)下的合作屬於工具主義性質，因而不穩定的特徵；而在第三等級內化下的合作(對合法性的認同)才是穩定且能持續的合作模式。而合作模式本身也將隨著無政府文化的不同而呈現多種面貌，譬如霍布斯文化(the Hobbesian culture)下的合作是稀少且困難的，洛克文化(the Lockean culture)下的國際合作明顯較為頻繁，但主要是注重結果收益的消極合作，在康德文化(the Kantian culture)下的國際合作則更為密集，且彼此

⁸ 宋秀琚，〈淺析建構主義的國際合作論〉，《社會主義研究》，第5期(2005)，頁117-119。

合作的國家所關注的並不只是私有利益，更包括集體利益的得失。

宋秀琚表示建構主義的合作文化論並非強調文化與互動才是合作的主因，而是呈現了國際合作普遍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動因—合作的產生可能是出於現實主義的權力分配考量，可能是出於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規範，也可能是出於建構主義的文化觀念作用；不同的觀點，彼此間可以並存互補，為當代大部分的國際合作提供解釋。

3. 簡評

理論探討類研究是中國建構主義研究的主要類別，相關文獻多為介紹式作品。在宏觀式研究部分，主要包括了對主流建構主義的介紹、對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的介紹，以及對建構主義中其他非主流學派的介紹等主題。這一區塊屬於著重廣度的表層分析，在建構主義進入中國學界後已有許多學者對此進行研究，後進研究者要在此類別中提出更具質量且避免重複的研究成果並不容易。⁹因此，本類別中的許多作品皆偏向特定環節研究，這類研究相對著重深度，有助於推動研究者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更細膩的探討，對於提昇中國建構主義研究的質量或有助益。

(二)理論連結類研究

1. 主流範式間比較--張建新：〈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問題〉

張建新的〈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問題〉一文，其主題為本類文獻中常見的主流範式間比較—就國際關係主流學派間進行比較分析。文中被提出與建構主義理論相互對比的學派分別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以及理想主義(idealism)三者。¹⁰

在新現實主義部分，張建新指出，國際政治中的物質主義與理念主義並非全然無法並存。國際政治的高度複雜性，使得研究者必須同時透過兩種方法進

⁹ 王軍、但興悟，《中國國際關係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編譯社，2008年），頁46。

¹⁰ 張建新，〈關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1期（2004），頁41-42。

行研究方能把握國際政治的「內在規定性」。在新現實主義獨占鰲頭的時代中，研究者僅透過物質主義的視角對國際政治進行觀察，而建構主義則提供了一種理念主義的視角供研究者選擇。

在新自由制度主義部分，張建新認為其與建構主義之間是一種相互包含的關係。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重心在於對制度與機制的研究，而研究機制與制度時，勢必要對該制度的動力問題進行討論，建構主義的文化與行為體認知等概念則可提供機制動力來源的解釋。

在理想主義的部分，張建新認為將建構主義視為是理想主義的改良版本的這種常見觀點是錯誤的。他指出，之所以會有這種觀點產生，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溫特對康德文化的論述。但事實上溫特本人並不認為國際關係的體系文化必然地會由霍布斯到洛克、由洛克到康德的單向模式發展。張建新強調，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文化在特定狀況下甚至還會出現倒退的情形，以拿破崙戰爭與兩次世界大戰為例，即可說明在洛克無政府文化中，也存在著到退回到霍布斯文化的可能性。

2. 周邊理論比較--郭樹勇：〈女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社會學〉

郭樹勇〈女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社會學〉一文屬於本類研究中的周邊理論比較類型，將建構主義與非屬主流理論的女性主義理論，以及存在具有爭議性的國際政治社會學(IPS)共同進行討論。該文認為透過對建構主義理論資源的汲取，可以有效推動上述兩類學科的發展。¹¹

在溫特對國際政治理論的分類中，女性主義理論被歸屬於理念主義/整體主義類別，與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後現代主義理論同類。¹²因此，在理論本質上，建構主義與女性主義是相近的。郭樹勇認為，透過對主流建構主義的借鑒，可以淡化女性主義的強烈批判立場，避免重蹈 80 年代非主流學派只破不立的覆轍。他鼓勵女性主義學者參考建構主義由激進到主流的發展歷程，在保

¹¹ 郭樹勇，〈女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社會學〉，《國際觀察》，第 1 期(2007)，頁 1-8。

¹²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1-32。

留理論基本核心的前提下，對國際政治進行較為實證性的客觀研究。

而所謂的國際政治社會學，是指以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對國際社會進行解釋與觀照的學術研究。相對於當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蓬勃發展，國際政治社會學的發展相對遲緩，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國際政治是否具有社會性質這一點尚未得到學者們的共識。郭樹勇表示，討論國際政治社會學是否可能建立，有三個基本的問題必須回答：國際政治是否具有社會性？若有，那麼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程度如何？以及用社會學方法全面研究國際政治是否可行？關於上述問題，他指出，透過建構主義與英國學派學者的論述，國際政治的社會性已逐漸得到普遍接受。而近代國家間的相互依存與密集互動將進一步的加強這種社會性的存在，因此國際政治的社會性程度正日漸加強。最後，關於是否可用社會學方法對國際政治進行全面性的研究這個問題，建構主義的成功發展就是最好的肯定回答。因此，郭樹勇認為，建構主義理論是建設國際政治社會學的重要素材。

3. 簡評

本類研究的重心在於建構主義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間的比較，包括主流範式間的比較與周邊理論比較都可能對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產生重要影響：首先，透過理論間比較，有助於突顯建構主義的理論特色與獨到之處，使後進研習者對該理論有更加清晰的認識與把握。其次，如同郭樹勇一文所提出的概念，理論間的相互連結有助於推動中國學者將研究外延化；亦即運用建構主義理論中的學術資源，支持部分在中國尚未發展成熟的理論，如女性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等的研究與建設，有助於擴大中國國際關係的研究範圍。

(三)經驗研究與政策分析類研究

1. 個案研究--劉永濤：〈重新思考朝鮮核問題：安全與身份〉

劉永濤所著的〈重新思考朝鮮核問題：安全與身份〉一文屬於本類研究中

的個案式研究，以北韓核武問題為主題進行探討。作者指出，冷戰以來，美國在處理北韓核武議題上，始終維持著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視角—或是以經濟制裁與軍事威懾阻北韓當局發展核武，或是透過政治、經濟接觸，以及建立談判機制試圖緩和緊張局面，美國的亞太駐軍配置與六方會談等機制的建立即為例證。

然而多年以來，透過上述視角而採取的諸多政策與行動，並未成功改善朝鮮半島的環境與局勢，核擴散議題與朝鮮半島的軍事衝突危機至今並無太多進展。這或許說明了在此一議題上，傳統視角的開闊性有限，有必要引進新的觀點對該議題進行重新解讀。對此，劉永濤認為建構主義的視角頗具參考價值。他指出美國與北韓對彼此與自我的身份與認知充滿猜疑與敵意，這種認知是在雙方過去多年來的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若欲對之加以改變，則應當提昇雙方的交流與對話，使雙方對彼此的意圖與思維有更多的瞭解，以降低猜疑與不確定性。

同時，歐美國家亦應繼續維持甚至擴大對北韓的合作與援助，以對平壤當局釋出善意。這些善意或可逐漸改變北韓對西方國家的認知，並進而對自我定位加以調整。換言之，劉永濤認為北韓問題表面上是物質面的核擴散問題，但實際上還是屬於精神面的認知問題與文化問題。在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視角外，加入建構主義的視角予以觀察，將更可能使東北亞的區域安全得到改善。

13

2. 宏觀層面研究--袁正清：〈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

袁正清所著的〈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一文屬於本類研究中的宏觀式研究，跳脫特定個案，對國際政治實務進行更具整體性的觀察。該篇文獻指出，建構主義是對各國外交政策進行分析的有效工具，透過建構主義的視角，往往可以對部分主流學派觀點無法解釋的事件作出妥善的說明。¹⁴

該文以德國與土耳其為例，說明建構主義對於外交政策解讀的重要性。首

¹³ 劉永濤，〈重新思考朝鮮核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第3期(2007)，頁42-47。

¹⁴ 袁正清，〈建構主義與外交政策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9期(2004)，頁8-13。

先，二次大戰後的德國成為美蘇意識型態鬥爭的競技場，並因此一度分裂為兩個國家。冷戰結束後德國再次統一，其政經力量逐漸加強。按照現實主義的觀點，德國在國際政治中的權力地位將得到提昇，開始採取更積極的外交政策，努力加強軍事力量，並因而對周邊國家造成威脅與壓力，使得歐洲政治出現不穩定的變化。但事實上，統一後的德國積極參與歐洲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多邊機制，並大力推動歐洲的一體化進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預測落差，袁正清認為原因在於歐洲的制度與文化不僅約束了相關國家的行為，更深入的改變了各國對自我身份與利益的認知。

在土耳其的部分，該國地理上位於東西方文明的交會處，國內人口多數信奉伊斯蘭教，政治上則受到西方民主文化的薰陶。在這樣的先天條件下，按照現實主義的觀點，土耳其應當利用自己的中心位置，在東西方的政治運行進行靈活的操作以牟取利益。但事實上，土耳其並未奉行靈活調節的政策思維，長期以來該國都屬於西方民主陣營的一份子。對此，現實主義的解釋是認為土耳其透過參與西方民主陣營爭取歐美國家的支持，以對抗冷戰時期來自蘇聯的強大威脅。但建構主義學者則駁斥這種觀點，他們指出，土耳其在冷戰開始前就已與西方民主國家位於同一陣線，在冷戰結束之後也並未因蘇聯威脅的消失而背離民主集團，仍然保持了對北約等多邊國際機制的積極參與。因此，建構主義者認為僅僅通過物質力量與功利角度將無法正確解讀此一議題。建構主義的觀點指出，土耳其對於西方民主國家的支持本於其對民主文化的認同，這種認同形塑了土耳其的國家定位，使其將自己視為是西方民主國家的一員，因此推動其與西方國家緊密結合的原因不在安全，而在認同。

袁正清表示，建構主義同樣有助於解釋中國的外交政策。他建議歐美各國透過建構主義觀點，將規範、認同等觀念一併納入考量，對於中國的觀察不應僅停留在物質實力的表象層次。由於當代中國積極的參與國際社會，使得中國的國家身份在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上都出現了再造的情形，因此西方國家在觀察中國國家實力提昇的同時，更應該關注在力量中所隱藏的社會意義，才能

瞭解中國的真實面目。

3. 簡評

薛力與肖歡容指出，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中向來有著偏好經驗研究而較忽視理論探討的特徵，但在建構主義的研究中卻呈現完全相反的情形：相關著作多數集中於理論性的研究，對於實務的分析與操作卻相對少見。¹⁵作者認為，以下兩個因素將可能使本類研究在未來得到更多的重視：首先，隨著時間推進，建構主義研究中的理論探討類介紹性文獻應將逐漸飽和，避免主題的重複將變得困難；而在相關理論研究尚無法提出創新的情形下，將研究主力轉向發展空間較大的經驗研究是可能的趨勢。其次，近年來中國政府的部分外交政策與宣示，如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三鄰外交等概念皆與建構主義有著某種程度的暗合(參見下文)，這種情形也可能鼓勵中國學者將研究重心由理論研究轉向實務分析。

肆、原因探討

前文提及建構主義近年來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對於這種現象，背後必然有其原因。筆者認為，對於相關原因的探討有其必要性。透過原因探討，有助於瞭解建構主義在中國的蓬勃發展，究竟是單純的中西學術思想交流？是缺乏深思熟慮的集體盲從行爲？又或者其背後確實存在著一些具體的因素？對於以上問題，作者的看法是建構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背後有其相關因素存在。對此，本文提出了三種可能的因素：

1. 與儒家思想的契合
2. 中國近代對馬列思想的研究
3. 提供中國對國際政治事務的思考途徑

¹⁵ 薛立、肖歡容，前引文，頁 40-48。

在三項因素中，提供中國對國際政治事務的思考途徑一項是促使建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主要動因，建構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對應了中國現階段的政治需求。而儒家文化與對馬列思想的研究二者，則提供了有利於建構主義發展的客觀環境。上述三項因素的交會，造就了建構主義近年來在中國的順利發展。

一、與儒家思想的契合

關於建構主義理論得以在中國順利發展的原因，或許可以由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加以探討。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雖具有多元的面向，但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儒家思想。中國傳統儒家思維與建構主義思想至少在以下兩個部分存在著一定的契合：

(一)對物質力量的觀點

中國傳統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對功利性的物質力量抱持著次要性的觀點，對於仁義道德等精神層面的力量似乎更為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儒家學派如同建構主義一般，對於物質力量雖不盡否定，但卻將之視為次要因素。例如孔子就主張少談物質利益，多研究仁義、天命等抽象精神理念。¹⁶比較明確的一個例子見於孔子與子貢就政治原理進行的一段對話，孔子在對話中提出了他認為政治運作應具備的三項要素——「充足糧食、充足軍備以及提昇政府威信」。在此三者中，孔子指出，如果迫不得已必須進行取捨的話，糧食與軍備等物質資源皆可妥協，但政府的威信必須維持，因為政府的運作憑藉人民的信賴，當人民不再信賴政府，國家也就不存在了。¹⁷

在這種觀點中，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儒家學派的物質力量次要性概念，同時也隱約顯示了其對行為體認的重視。正如秦亞青所言：「建構主義本體論是

¹⁶ 《論語，子罕第九》：「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¹⁷ 《論語，顏淵第十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一種弱化物質主義的實踐本體論...在很大程度上,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和文化理念在本體論上也不過分地強調物質主義。」¹⁸

(二)對人際互動的重視

儒家學派對於中國思想的另一個重大影響是對人際關係與互動的重視,這一點也與建構主義重視行為體實踐與互動的觀念相契合。

首先,儒家學派為社會確立了五個特定領域的人際關係典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在各類人際關係中,行為體之間並非僅是單向的威權式運作,而是雙向的共構式互動。以君臣關係為例,儒家學派提出的運作原則是臣屬忠心侍奉君主,而君主依照禮制調度其臣屬。¹⁹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中,如果為臣的一方破壞了這種人際關係的互動,那就是「不臣」,君主可以國法加以制裁。如果為君的一方破壞了這種人際關係互動,則臣屬亦可背棄君主,甚至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加以反抗。²⁰換言之,在儒家的思想系統裡,人際關係的面貌是由行為各方互動而成的。最明顯的例證可能是孟子與齊宣王的對話。孟子指出,如果君王視臣屬如兄弟手足,則臣屬也將對君王推心置腹;如果君王是臣屬如犬馬差遣,則臣屬也將僅視君王為路人,而無情感認同;如果君王視臣屬如草芥般卑賤,則臣屬也將視君王為仇敵。²¹

由上述可知,在儒家思想的原型中,人際關係固然有其需遵守的規範,但實際的運作上,仍取決於各方行為體的互動,這些互動決定了各種關係領域中的結構面貌。因此,儒家思想對建構關係的重視甚於單向的因果關係,這與建構主義的核心思想亦不謀而合。

¹⁸ 秦亞青,〈建構主義:思想淵源、理論流派與學術理念〉,頁 1-23。

¹⁹ 《論語,八佾第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²⁰ 《孟子,離婁下篇》:「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²¹ 《孟子,離婁下篇》:「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二、近代中國對於馬列思想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之後，以馬列思想為指導，對國家社會的各個層面進行了實驗性的改革。同時政府也將相關思想透過教育、宣傳等方式直接、間接的灌輸予社會大眾，這使得早期中共舉國上下皆受到意識型態的強烈影響。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對於意識型態的執著已經逐漸淡化，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卻被保留了下來。中國內部長期以來為馬列思想的意識形態所影響，而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親緣性，因此近代中國的環境氛圍對於建構主義理論的發展，有著相當的助益。有關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親緣性問題，作者認為可以就以下兩點進行討論：

(一)認識論方面的一致

建構主義源於 80 年代的反思學派，其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該學派的影響。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初期的建構主義(乃至後期的激進建構主義)，在認識論的基礎上，都採取了詮釋學途徑，具有濃厚的反基礎思維。這類觀點認為不存在一個客觀真實的世界可供指涉，所謂的世界是被行為體的思維與實踐所建立的。因此對於事件與行為不應僅由表象進行解讀，而應深入探討個案中的行為體動機、制度影響等等因素。²²

溫特在建設主流建構主義理論時，拒絕沿用這種詮釋學途徑，而改以科學實在論作為其理論的認識論基礎。他認為，詮釋學途徑雖有其價值，但存在兩個弱項：首先，詮釋學途徑認為對事物的探求，必須揚棄表象，而深入至個案中的環節進行分析；這種作法雖有其價值，但缺點在於無法建立起一套客觀通用的標準與法則。其次，詮釋學的運作方式是透過敘事(narrative)與描述(description)，這些方式主要依賴研究者的心智感知，而這種感知是極不可靠的，諸如再現失敗(representational failure)、錯誤詮釋(misinterpretation)等可能性的存在，都使詮釋學途徑的精確性備受質疑。²³

²² David Marsh 等著；陳義彥等譯，《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台北：韋伯，2009年)，頁 31。

²³ Wendt, *op. cit.*, p.56.

溫特在認識論立場上援用了實在論途徑。實在論與實證主義一樣屬於基礎論觀點，相信世界獨立於行為體的意識之外，認為在現象與結構之間存在因果作用。與實證主義不同的是，實在論者認為社會現象並非全都可被觀察，許多現象與事件所顯示出來的表象是錯誤的，甚至具有誤導性，導致事物的真實內在結構無法被直接觀察。但即便如此，這些深層結構仍然存在，研究者可以「最合理理論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假定其存在。因此，實在論一方面超越了實證主義的觀察範圍，另一方面形成了表象與真實的二分性思維。

馬克思主義是採用實在論立場的典型，該理論秉持實存與表象的二分性思維：一方面承認世界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指出社會現象無法被研究者直接觀察。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由許多進程與結構組成的，但這些進程與結構在特定的經濟利益考量下，被有系統的掩蓋，而使研究者無法直接觀察存在於表象之下的真實。因此，真實的存在無法被科學性的證明，僅能確認「存在著一種實在性」。²⁴在認識論上的一致，使得轉向後的主流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了基本的交會。

(二)社會學與哲學思維的共通

除了在認識論方面的一致外，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在社會學與基本哲學思維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會。首先，馬克思在黑格爾(Georg Hegel)處承繼了辯證法(dialectic)思想，打破了二元對立的觀念，並將之運用至人與社會的關係之上。由此，馬克思主義提出了一連串的互動關係：社會與人的相互生產、歷史與人的相互創造、環境與人的相互影響。換言之，在馬克思的觀點下，行為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單向的制約影響，而是互生、互動、互為因果的關係，²⁵這實質上已接近建構主義的互構觀念。此外，這兩派學說對於實踐也都甚為重視，與新自由制度主義、新現實主義的經濟學方法、物質主義取向不同，建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承認在物質因素的影響力之外，行為體間

²⁴ Raymond Aron 著；姜志輝譯，《想像的馬克思主義》(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年)，頁6。

²⁵ 鄭杭生，〈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社會學視野》，創刊號(2003)。

互動與實踐的重要性才是國際政治的主要動力來源；建構主義是一門強調互動與實踐的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文化的產生與變遷，都是透過行為體間的互動所造成的；馬克思主義則主張實踐唯物主義，重視世界交往的觀念，²⁶兩者的基礎觀點是相近的。

三、提供中國對國際政治事務的思考途徑

首先，在學界觀點方面，有部分學者認為建構主義理論對中國的價值，並非僅止於學術研究，更在於其可與中國的現實需要相互連結。換言之，建構主義理論的操作，可以幫助中國在國際政治運作中認清並處理一些問題。

王軍與但興悟指出，建構主義對中國的一個重要意義在於提供一個有別於西方國家的觀點。由於包括美國及歐洲各國在內的主要西方國家，傳統上都偏好以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角度看待國際政治，雖然這些視角所呈現具有一定的準確度，但礙於其理論的侷限，必然存在著行為體無法觀察到的部分。他們指出，西方的主流學派觀點時常對中國產生偏見、誤解與質疑。在這個議題上，中國需要建構主義理論，透過對該理論的把握與操作，中國將得以透過不同的思維途徑對相關批判作出回應與辯駁。²⁷

郭樹勇則指出，從建構主義理論出發，可以擴張國際政治研究者的視角。一般研究者在看待國際政治事務時，多偏好以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視角出發。但透過建構主義的視角，在解讀許多重大議題時，皆可跳脫以物質力量為出發點的傳統觀察面向，而得到不同的解釋，提供決策者更多的思考方式與行為選項。以中國崛起論為例，郭樹勇指出，若以現實主義觀點對此議題進行討論，則很容易受到霸權穩定論等觀點影響，推導出中國的崛起將威脅美國的霸權地位，進而引發霸權戰爭之類的悲觀論點。但建構主義強調國際政治取決於行為體間的互動與觀念分享，提出在特定條件下無政府結構可以向康德

²⁶ 鄭杭生，〈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社會學視野》，創刊號(2003)。

²⁷ 王軍、但興悟，前引文，頁45。

式文化邁進。因而，不論是中國或美國，在未來的國際政治演變中，都擁有一定程度的能動性；對於行爲體而言，未來如何發展，相當程度上是操之在我的。

28

其次，除了學者的觀察之外，近年來中國的各種外交政策與宣示似乎與建構主義多有暗合，近來備受矚目的「和平崛起」與相關睦鄰外交政策或許可資參考。

80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方面迅速成長，受到世界各國矚目。在90年代以後，中國在國際間已經逐漸擺脫落後、貧窮等印象，而開始被視爲一個崛起中的大國。²⁹考量到中國缺乏透明的政治決策體制、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以及軍事建設的日益完善，包括中國的周邊鄰國與歐美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皆抱持著甚深的疑慮，也因此出現所謂「中國威脅論」等負面觀點。中國領導人對於外界疑慮的回應，反映了近年來中國外交思維的演變。

在90年代初期，中國官方對於相關議題並不甚重視，甚至積極舉行軍事演習，並介入南中國海與台灣海峽的爭議之中，凡此種種行徑皆加深了各國對中國的疑慮。至90年代末期以後至今，中國政府的外交思維出現了轉向，領導階層開始在國際公開場合進行重視和平、和諧發展等善意宣示，以求改變相關各方對中國的疑慮。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於2003年所提出的三鄰外交與和平崛起觀念即爲明例。

三鄰外交意指「睦鄰、安鄰、富鄰」，由溫家寶於2003年的東盟商業投資峰會中提出。其所蘊藏的意義是：中國一方面會與周邊國家和睦相處(睦鄰)，一方面會負起區域大國的責任維持區域穩定(安鄰)，此外更會在經濟方面加強與鄰國的合作，推動經濟區域一體化(富鄰)。³⁰同年稍晚，溫家寶在訪美期間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口號，表示中國的崛起將在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進行；

²⁸ 郭樹勇，〈試論建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前途〉，頁21-28。

²⁹ 摘自鄭宇碩，〈中國如何應對中國威脅論〉，收錄於朱雲漢等編，《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台北：五南，2007年)，頁141。

³⁰ 〈中國睦鄰、安鄰和富鄰的政策解讀〉，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14404/2007/09/18/2185@1770457.htm>

嗣後，其當局為避免敏感，更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以免引發負面聯想。不論是三鄰外交或是和平崛起，其本質上都是中國對相關各國的疑慮所作出的善意回應。就此可看出中國領導人對於周邊鄰國與歐美各國對中國的認知觀感甚為重視。

對於這種外交政策思維的轉變，可以在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下得到一定的解釋。如果純粹由新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相關各國對中國的看法並不重要，因為在該理論的思維中，影響國際局勢發展的因素主要是結構中國家的相對物質力量分配。至於主觀的認知與思維，新現實主義並未予以太多關注。這樣的觀點或許可以與 90 年代初期或更之前的中國對外政策特色相互結合，以解釋當時中國政府偏重物質實力，而較為漠視他國觀感的現象。

至於近年來中國奉行的敦睦外交政策，則可由建構主義的角度加以觀察。建構主義強調建構作用，認為行為體間的互動會形成共有知識，並進一步構成文化；文化將形塑行為體的身份，身份決定利益，並使行為體作出相應的行動。因此，在建構主義的理論中，各方行為體對特定行為體的認知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或許可以作出以下的解讀：中國近年來的敦睦政策，顯示其正努力以行動嘗試改變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認知，以避免中國威脅論等負面思維在相關國家間形成國際文化，並因而產生不利於中國的國際局勢發展。

綜上所述，建構主義在中國的成功發展，不僅是由於學者的偏好，或許更因為該理論對中國而言存在著指導實踐的價值。應該指出的是，建構主義的價值並非在於其能保證前景的和平，而是在於其提供了更多的發展可能性。如前所述，在建構主義強調行為體的能動性，認為行為體間的互動與實踐，可以改變無政府文化的意涵，進而發展出各種不同的國際政治前景。因此，中國需要建構主義，因為透過其觀點，雖然無法保證中國未來在國際政治中的發展將和平順遂，但至少避免霸權戰爭與國際衝突的可能性。作為當事國，中國本身就具有影響局勢的能動性，這賦予中國當局更為積極的外交實踐目標與願景。

伍、結論

一、中國建構主義研究的進步空間

透過對相關文獻的閱覽，以及參酌相關中國學者意見，本文以下將提出現今中國的建構主義研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進步空間，相關問題可分為以下幾點說明：

(一)學術資源配置不當

薛力與肖歡容對此一問題作了較為明確的估算，提出以下兩個面向：³¹

1. 期刊流動性不足：大部分的建構主義研究著作皆集中於幾部特定刊物，許多國際關係研究的期刊至今尚未刊載過建構主義研究相關著作。而許多曾刊載過建構主義研究相關著作的期刊中，其曾刊載次數也僅限於一、二次，在期刊發表的普遍性上還有進一步提昇的空間。
2. 研究團隊分配不均：據其等統計，在建構主義理論的研究者中，近82%的研究者集中在北京與上海兩地。對照中國內陸大學的數量，顯見研究者分佈的傾斜。³²這種外在資源分配與環境發展的失衡，說明了建構主義理論在中國的高校系統中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

(二)介紹性文獻過多

包括王軍、但興悟與楊廣等幾位學者都指出當代中國建構主義研究存在著介紹性文獻數量過多的問題。對理論進行介紹說明，本是闡明一門學科內涵的必要過程；但建構主義進入中國轉眼已近十年，相關的理論介紹，事實上已經

³¹ 薛立、肖歡容，前引文，頁40-48。

³² 根據中共教育部網站的資料顯示，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包括本科院校（大學）、普通高職院校（學院，包括政治學院）、國家批准設立的獨立學院、經國家審定的分校辦學點四類共有2286間，京津與上海佔206間。見：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3.jsp?tablename=736&infolid=27683>

相當的足夠，後進研究者若繼續在這一方面進行著述，一則無其必要性，二則其研究內容亦恐難免重複研究之虞，形成學術資源的浪費。上述批評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明確的數據可供印證。或許可以筆者本身經驗為例以資參考：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曾透過南開大學設立的「國關在線」網站進行對部分中國文獻的蒐集，³³據筆者的搜索結果，在該網站中的相關文獻在主題上與建構主義直接相關者約莫在 42 篇上下，其中介紹性文獻所佔比例約在 34 篇上下，超過三分之二。

(三)對歐美學說的探討不夠全面

以建構主義學派而言，溫特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影響中外研究者甚深。以其理論作為建構主義研究的基底並無不妥。但若大部分的學者皆如此，則說明中國學界中相關研究者對於建構主義學派的把握並不全面。在本文所接觸到的文獻中，大部分研究建構主義的中國學者，幾乎盡以溫特的理論思想為研究標的，對於其他學者著述極少提及。但事實上，除了溫特以外，如奧那夫(Nicholas Onuf)、拉格(John Ruggie)、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費里莫(Martha Finnemore)等人對於建構主義的理論與發展脈絡皆有相當深入的論述。例如溫特書中所強調的有關結構動態性質的觀點，在拉格 1983 年所發表的文獻中就已經出現類似的概念。³⁴又如費里莫以生命三週期的方式來討論文化的發展，亦與溫特對無政府文化三種內化等級的論述有異曲同工之妙。³⁵這些學者的論述與思想，在中國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雖有少數學者對之加以研究，畢竟無法為大多數研究者所關切。這種情況說明了中國學者在對歐美建構主義學派發展的掌握方面，其視野還有擴張的空間。

³³ 該網站由南開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設立，至 2009 年 3 月 24 日為止，收藏文獻約計 1417 篇，最後更新文獻日期為 2009 年 3 月 19 日。

³⁴ John G. Ruggi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World Politics*, Vol.35, No.2 (1983), pp.86-261.

³⁵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四)缺乏中國化

這一問題為郭樹勇所提出。他認為在建構主義的研究中，大部分中國學者都偏好進行理論研究，但轉眼之間建構主義進入中國學術界將屆十年，卻始終未聞中國學界在這方面曾取得什麼重大成果。建構主義本質上是一門外來理論，因此在進入中國學界的初期，研究者集中依循歐美著作對其理論進行介紹與說明是必要的過程，但是該理論在經過了長期的發展之後仍然未能產生「中國化」的研究成果。對此，郭樹勇提出了三個可能的原因：³⁶

1. 自我封閉：建構主義在歐美學界與國際關係的其他學派與理論互動頻繁，但在中國，卻出現了自我封閉的情形。部分研究者將心力投注於建構主義理論的探討，卻忽略了與其他國際關係學派進行互動。
2. 知識重複：中國學者的建構主義研究重複率過高，缺乏突破與創新的勇氣，被現有的研究框架所約束。
3. 概念洋化：對建構主義的研究長期沿襲歐美語言體系，將使得理論無法與本土語言結合，造成研究的影響力無法持久深入。

二、結語

本文以上的論述，對當代中國學界中的建構主義研究熱潮作出了初步的探討。建構主義在許多方面與中國環境具有親緣性，並契合了中國實務上的需要，因此造就其於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的迅速發展。但現階段的相關研究中，似乎並未發展出關於建構主義的獨到見解。筆者認為，在表面探索與介紹性研究日趨飽和的趨勢下，中國勢必要對建構主義研究提出獨立思想，方能突破瓶頸。這種獨立思想可能在學者的思考中產生，也可能在中國的外交實務中出現。因此，對於建構主義未來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似乎仍值得持續觀察。

³⁶ 郭樹勇，〈女性主義、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社會學〉，頁 1-8。